

【长三角两地书】

——上海人看宁波——

那句“阿拉”，融进你我性格里

俞亮鑫 上海华夏文化经济促进会副会长、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研究员

若说苏浙哪个城市对上海的影响最大，无疑不是苏州就是宁波。这从上海话的组成中加以辨别，如上海人自称是“阿拉”，就是典型的宁波话，也成了上海话的标志性符号。

小时候，弄堂里邻居有些是宁波人，这使石库门弄堂常飘着他们家自己腌制的臭冬瓜、咸黄鱼、黄泥螺、臭腐乳等食品味道。有同学祖母是宁波人，总见她满弄堂追着孙子端着饭碗大声叫着：“屈呐！屈呐！（意即吃啊，吃啊）”。记得那时到春节才能吃到宁波汤圆，那芝麻香味至今难忘。这是充满烟火气的上海弄堂生活。

我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我熟悉的宁波人不少，有邻居好友，有发小同窗，也有文化名人。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就是宁波余姚人。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宁波，就因读过他的《风雨天一阁》，就急着想去那幢古老的明代藏书楼，想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历史文化。那天细雨绵绵，满地落叶。我在花园里把脚步放得又轻又慢，细细品味，唯恐走得重了快了，会有悖于这浓郁的书卷气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位与余秋雨同年龄的上海文化名人是陈逸飞。他与余秋雨一样，也是1946年出生于宁波。我与这位温文尔雅、激情洋溢的著名画家也有过一些交往，谈的多是艺术。有一次，他约我去花园饭店谈一部影视片的创作。见面交谈时，他竟



宁波老外滩一幢建筑的局部。

视觉中国供图

然谈起我家，兴奋地说：“还记得吗？我去过你家，你家有一个老虎窗的阁楼书房，四壁满满的都是书。”我一下纳闷了，他能把我家的书房说得一清二楚，难道他真的来过我家？回到家，我把这一纳闷对太太说了。太太笑道，肯定是你把我家这阁楼书房对他说得十分详尽，竟然让画家把自己的丰富联想当作真实了。

由于余秋雨与陈逸飞，在我记忆中，宁波一直是个人杰地灵、名人荟萃之地。

以往，我印象中的宁波，很大程度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宁波人组成的。直到2016年，我作为中国长江韬奋奖的获得者，应宁波市新闻工

作者协会的邀请前去讲课，讲课空隙，我有机会去雪窦山看看，去奉化老街转转。宁波在我眼中这才变得更加具象、生动、鲜活。在老外滩，甬江、奉化江和余姚三江汇流，江海浩荡令人心生震撼。沿江大批的老建筑散发着历史文化的巨大魅力，重现了当年商贾云集、轮船来往的繁华景象。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这里还有老上海人十分熟悉的“弹格路”。

宁波的老外滩让我想起了宁波与上海相近的百年历史。鸦片战争后，上海、宁波和广州、厦门、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同时开埠，各国商人蜂拥而至，千帆汇聚，上海和宁波两地的外滩也应运而生。只是后来，黄浦江畔的上海口岸迅速崛起，上海外滩的知名度无疑更高，也许正是这一点，上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宁波人离开了家乡，他们坐着海轮前来闯荡上海滩，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贡献。有资料显示，上海开埠后，宁波帮在上海做生意的人最强，也是最多的，占了上海工商界的七成，并至少创造了50个“第一”。状元楼、鸿运楼等，都是沪上久负盛名的甬帮菜馆，市场上到处回响着“阿拉”的声音。久而久之，在移民汇聚的大上海，都流行称自己为“阿拉”了。

宁波与上海虽为一水之隔，但与苏锡常和杭嘉湖相比，两地陆地距离更为遥远。但一句“阿拉”、两个外滩，把这两座隔着杭州湾相望的城市紧紧连在了一起。宁波，既深刻地影响了上海这座城市，也极大地影响了上海人的性格。

——宁波人看上海——

上海的模样，一如我们年轻时

毛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

1988年来上海读大学前，我一直待在宁波，虽然寒假会跟父母到上海看爷爷奶奶，但主要是旅游。小时候爷爷带我到国际饭店，我上上下下电梯坐了有十来趟，回到宁波跟邻居小朋友反复炫耀，让姐姐鄙夷了一句：那你别回来啊。

家是要回的，但是天天黄昏天天清晨，听着几百米外轮船码头的汽笛声，想着又一人出去上海，又一人从上海回来，会莫名地觉得，上海就是宁波的亲人。

应该就是亲人吧。一半上海人祖上有一个宁波人，我到华东师大上学，晚上跑学校后门用宁波话买小馄饨，阿姨很亲切地叫我“小宁波”，她看我狼吞虎咽完馄饨，转手送了我一个生煎馒头，说，吃饱就不想家了。那个生煎馒头我低头吃了很久，直到眼泪干了才抬头对阿姨说谢。

不是所有的外地人在上海会被馈赠到一个生煎馒头的。不过，我们后来都选择留在了上海。这个被叫成“魔都”的都市，确实有她的魔力。像天钥桥路，就是一条魔法街。2000年，我在香港读完博士，回到上海，住到了徐家汇最热闹的地方。外国朋友来找我，常常会比约定的时间晚到，因为他们被天钥桥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吸引了。像萨宾娜就会激情地说，我今天在这条街上看到的人，比我在托皮卡一年看到的人都要多。我想她大概没夸张。在天钥桥路住了三年，每天中午，我在美罗城门口看到的必顾客顾队伍，真的是全世界最长的。三年，我们楼下的店铺至少换了20个老板。常常，这一周卖玩具，下一周卖皮具，周五回家还是卖时装的，周六下去在卖鸭脖子了。他们像是这个城市的快闪演员，在我们试图洞悉他们的秘密前，消隐人间。而晚上的天钥桥路会有更多的快闪秀发生，卖栀子花的阿婆边上，有一个年轻女人拎着篮子，里面是几只萌到你融化的小猫小狗，隔十来米，有中年男人在卖外文书，中年女人在卖长筒

袜，这是7点钟。等到9点的时候，年轻女人、中年男人和阿姨都消失在茫茫人海，在他们的位置上，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在那里弹唱他自己的歌，“不要告诉我你不在乎我”，你往他的吉他盒里扔钱或不扔钱，他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这是上海，这个城市混合了热情和冷漠，世故和呆萌，在我们茫然冲入魔都时，我们被它大开眼界、被它伤害，甚至背叛，但它偶尔也会被我们打动，显灵般地展示特别抒情的一面。就像这个冬天，下了整整一个月的雨，我们对面的小理发店门口，晾满了毛巾和员工衣服，每次我们走过，老板就会垂头丧气地说一句：“再不出太阳，毛巾不用了。”然后，终于，上周日上午，太阳出来，老板坐在理发店门口，看阳光把香味送入每一块毛巾，看他的理发师和洗发姑娘在那里吵着甜蜜的架，“寒假我是绝不会跟你回家的！”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这是上海。在这个地方，你不会老去，所以，虽然我妈妈一直觉得我在上海很辛苦，觉得上海的生活质量不如宁波，海鲜都是冰冻的，但是，每次，她还是会由衷地说：不过，你在上海挺开心吧？我没脸对妈妈说是的，我在上海挺开心的，因为上海，就像侯麦电影中说的那样，你站在淮海路、衡山路、思南路，你遇到的人都比你年轻，你会觉得，自己也跟他们一样年轻，有力气去经历生活、经历危险，有力气怀着初恋般的元气再出发，就像歌里唱的，“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这是上海。这个城市还在经历她漫长的青春期，而我们有幸和她一起成长。“我熟悉你的每一道纹理，你了解我的诗行”，这样清澈的人生，该是人和一个城市能展开的最好相遇吧。

上海开埠后，到上海的宁波人更是“掣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在上海，宁波人既有从事新式商业，也有投资近代民族工业者。据《鄞县志》记载：“世家子弟至有毕业学校仍往上海而为商者，良以地当商埠，习于纷华，故皆轻本业而重末利也。今有‘上海为宁波第二故乡’之谚焉。”

同时许多下层百姓到上海谋生，他们有的在企业中做工，如江南制造局中，“工匠皆闽、粤、宁波人”，上海纱厂“技术人员及汽缸工则多为广东或宁波人”。也有在外轮上当船员、杂工，还有的专给洋人做西服，称为“红帮裁缝”，在上海学生意、当学徒的宁波人更是不可计数。《海关报告》中对上海各业从业人员概况描述：“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沪宁波人势力发展到盛极之时。他们以成立于1911年的新型同乡团体宁波旅沪同乡会为核心，发挥其擅长经商才能和优势，逐渐渗透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五金、新药业、颜料等行业，基本上由宁波人控制，在上海金融、航运业中，宁波人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之上海本国人商人之势力，当以宁波商人居王位。”

据研究者对1936年前上海238家民族资本工厂创办者的调查情况来看，由宁波人开办的企业就有50余家，约占25%。“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有更多的智力可供使用”，近代上海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大量宁波人及各方移民的辛勤劳作。

宁波与上海之间无形中透着亲和感，两地长期交往密切，有着浓厚的“亲缘关系”

一声“宁波亲眷”道不尽沪甬情缘



李晨

中国商业史学会商帮史专委会副主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敬恭桑梓：对家乡故土的反哺

鸦片战争后，上海和宁波本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宁波在开埠前及开埠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外商心目中“一个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有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使者曾在其日记中对宁波极尽夸赞之能事，谓宁波的人口和幅员都是“欧洲产品的现成市场”，其“房屋建筑的整齐华丽，以及商业声誉的无与伦比，在中国可称首屈一指”。但由于上海开埠后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租界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成为长江三角洲以至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多功能经济中心。

上海与宁波，隔杭州湾相望，且两地同属吴越文化圈。宁波人之于上海，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不仅象征着“创新、进取”的特质，许多上海人家的“宁波亲眷”也在无形中透着亲和感，可以说两地有着浓厚的“亲缘关系”。

“到上海去”：两地的亲缘关系

上海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留存着太多宁波人的流风遗韵。早在上海开埠前，就有许多宁波人到上海经商从业。康熙年间海禁废弛后，沿海贸易及江南的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上海以其得天独厚地理优势，逐步成为当时南北之间、沿海与腹地之间商品流通的枢纽。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宁波人到上海谋生、从商。此时旅沪宁波人特别是在盐业、药材、南北货等行业中占据绝对优势。

清朝嘉庆二年（1797年）四明公所成立，这是旅沪宁波商人钱随、费元圭、王忠烈等人出于联络桑梓情谊、互帮互助的目的，在上海创建的乡团。四明公所最主要的活动是为同乡办理寄柩，推行善举，在近代上海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1874年、1898年两次“四明公所事件”，是上海人民自发反抗殖民者暴行的斗争，成为“近世中国历史上政治罢工以抑制外力的嚆矢”，也使旅沪宁波人以“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名扬海内外。

同时许多下层百姓到上海谋生，他们有的在企业中做工，如江南制造局中，“工匠皆闽、粤、宁波人”，上海纱厂“技术人员及汽缸工则多为广东或宁波人”。也有在外轮上当船员、杂工，还有的专给洋人做西服，称为“红帮裁缝”，在上海学生意、当学徒的宁波人更是不可计数。《海关报告》中对上海各业从业人员概况描述：“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沪宁波人势力发展到盛极之时。他们以成立于1911年的新型同乡团体宁波旅沪同乡会为核心，发挥其擅长经商才能和优势，逐渐渗透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五金、新药业、颜料等行业，基本上由宁波人控制，在上海金融、航运业中，宁波人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之上海本国人商人之势力，当以宁波商人居王位。”

据研究者对1936年前上海238家民族资本工厂创办者的调查情况来看，由宁波人开办的企业就有50余家，约占25%。“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有更多的智力可供使用”，近代上海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大量宁波人及各方移民的辛勤劳作。

在上海经济贸易的强辐射圈内，宁波原先的贸易优势逐渐消退，港口功能单一，辐射力不强，变成了为上海这个贸易中心起辅助作用的“运输中心”。它的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的90%由上海转运。有鉴于此，大批宁波商人纷纷前往更适于营商的上海，开辟更广阔的市场。

但这种“甬沪消长”的现象并不具有悲剧色彩，相反，这恰恰是宁波人见识和魄力的显现，正如美国学者苏珊·曼指出的：“宁波商人离乡背井寻找新的市场和放弃宁波作为一个繁荣的外贸港口的目的，正是为了要保持那样的繁荣……他们将宁波的繁荣寄托在经营另一个地方的基础之上，从而在两个据点而不是从一个据点取得利润。”大批的宁波商人纷纷前往更适于创业、经商的上海，他们极大地助推了上海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又本着“敬恭桑梓”之心意，反哺“生养于斯”的家乡故土。

1887年，著名的旅沪宁波商人严信厚与周晋箴等人在宁波开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这是宁波的第一家近代企业，而且也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之一。以后通久源纱厂、通久源面粉厂等在严信厚等人的主持下，相继成立；浙东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永耀电力公司也是周仰山、虞洽卿、刘鸿生等旅沪甬商在宁波创建的。此后，办厂之风相继迭起，对于宁波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同时，许多旅沪甬商以自身家资倾力办学的事迹广为传诵，仅就镇海一地而言，“五金大王”叶澄衷晚岁立志捐资创办的叶氏义塾，以教育成就卓著、办学独具特色而享誉社会；叶氏义塾以后发展为中兴学校、中兴学堂、中兴小学，亦以人才辈出而誉播四方，从“中兴”走出了一大批饮誉海内外的商界巨子，如包玉刚、邵逸夫、叶庆年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长三角”成为各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特别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拉近了上海、宁波两地的距离。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开启新征程，沪甬两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宁波等长三角城市固然需要与上海的接轨，以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发展的深度、广度、力度，而另一方面，上海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更需要与宁波等其他城市形成互补互惠、互动互助的关系。只有沪甬等长三角核心城市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真正实现深层次、全方位、多维度的“高质量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创新发展才能为中国经济铸就更加辉煌的业绩。



合成图：前景为上海外滩夜景，背景为宁波天一阁建筑局部。视觉中国供图